



守望·追寻·创生：

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

Watching, Seeking and Creating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West China Novels

赵学勇 王贵禄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守望·追寻·创生：

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

Watching, Seeking and Creating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West China Novels

赵学勇 王贵禄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赵学勇，
王贵禄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0627-0

I. ①守… II. ①赵…②王… III. ①西部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9788 号

书 名：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

著作责任者：赵学勇 王贵禄 著

责任编辑：张文礼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627-0/I·245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26.5 印张 480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引 论	中国西部文学潮：文学史意义的重估	1
一	西部文学：概念、“他者”身份及非文学导向	1
二	文学西部：空间的文学化与概念的合理性	4
三	超越地域：西部文学亟待品格的提升	8
第一章	西部小说：历史分期及时段特征	11
一	西部小说研究三十年	11
二	沉重的命名	16
三	历史分期与时段特征	19
第二章	在乡野及牧场之间：西部小说与地理人文环境	26
一	西部的地域文化特征	26
二	自然景观的深层解读	30
三	西部人物和风情的集中展示	35
四	寻根之路的延展：西部生态小说的崛起	48
第三章	超验叙事：西部小说与宗教民俗文化	54
一	文化与人的同构	54
二	神秘主义与鬼怪书写	57
三	宗教羽翼下的灵魂救赎	63
四	神性：西部存在的超验表达	69
五	民俗：作为民族精神的沉淀	73
六	民歌：从日常生活到情爱体验	77
七	方言：西部叙事的生命之光	81
第四章	异域的呼唤：边地书写与荒原叙事	85
一	边地：一个说不尽的话语空间	85

二	“在路上”：边疆书写中的历史意象	88
三	垦荒：边疆书写中的哀乐人生	94
四	共时态：边缘书写中的文化图景	99
五	荒原叙事：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变奏	106
第五章	传统与现代：西部小说叙事的母题衍化	118
一	“现代性”冲突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18
二	现代性思潮裹挟下的西部叙事	119
三	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及融汇	123
四	现代文明的贫困与重返民族传统的姿态	125
第六章	重铸民族之魂：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	129
一	西部作家的队伍结构	129
二	苦难体验中民族自信力的艺术呈现	130
三	弱势群体话语立场上的终极关怀	135
四	自然生态与文明形态的审美描述	140
第七章	为谁写作：西部作家的底层意识	147
一	底层、底层文学与底层意识	147
二	革命话语主导下的底层表述	150
三	文化精英的底层体验	154
四	现代性视阈下底层表述的多向度拓展	157
五	消费时代的底层呈现	162
第八章	新生代西部作家：转型时期的文学能指	167
一	称谓的指认	167
二	巨变时代的文学精神建构	171
三	历史机遇及写作困境	177
第九章	长安文化：当代秦地作家的精神血脉	185
一	问题的缘起	185
二	题材选择：乡土与农民	187
三	主题话语：悲悯与进取	189
四	风格追求：恢宏气象与史诗品格	192
五	叙述方略：宏大叙事与传奇演绎	195

六 长安文化的当代意义	199
第十章 从现实走向诗意：西海固作家的乡土叙事	201
一 “西海固文学”的在场	201
二 苦难大地的诗意化呈现	204
三 消费时代的“边缘”写作	210
第十一章 柳青：一种叙事范式的生成	217
一 《创业史》：肉体的退场与灵体的走向“神性”	217
二 文学史叙事与经典秩序的变更	223
三 “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	226
四 《创业史》：文学史意义的再评价	230
第十二章 张承志：一个浪漫骑士的精神之旅	236
一 张承志研究的启示	236
二 向着自由的精神长旅	244
第十三章 路遥：富有“张力”的文学存在	257
一 在“冷”与“热”之间	257
二 一部影响了当代人的叙事文本	263
三 “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	267
四 再议被文学史遮蔽的路遥	285
第十四章 贾平凹：从山地到都市的心路历程	289
一 乡土的“复魅”：“乡下人”的审美追求	289
二 欲望叙事：一个“农民”试图征服城市的方式	301
三 《古炉》中的“说病”：“末法时代”的文化救赎	311
第十五章 张贤亮：忏悔的灵魂与饥渴的肉身	320
一 灵与肉的冲突：一个绕不开的叙事母题	320
二 生命的顿悟：“饥饿美学”诞生的历史语境	323
三 生存何为：一个知识者灵魂的多面性	326
四 祛魅：“小写的人”的局限	323
第十六章 《白鹿原》：乡土中国的多重镜像	333
一 “多义性”的叙事文本	333

二 回归“西部小说”的漫漫之旅	342
三 “经典”意义与文学史叙事	350
第十七章 “全球化”时代：西部小说的选择与趋势	356
一 时代洪流中西部小说的可能向度	356
二 深度探寻与“反观叙事”	362
三 从“固守”到“突破”的必要准备	368
四 再思考：民族性与世界性	373
五 西部精神：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378
六 在“抵抗”与“坚守”中互动	383
七 不了的追问：西部小说如何被当代文学史叙述	388
结 语	397
参考文献	401
西部作家简介	410
后 记	417

引论 中国西部文学潮： 文学史意义的重估

追溯“西部文学”命名的缘起，辨析这一命名之所以含混的原因，直面西部文学所处的“他者”境遇，是西部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要前提。纵观近三十年的西部文学创作与研究，其虽然已经具备了“入史”的实绩与价值，但仍难以改变当代文学史叙事中的“他者”形象与“边缘”位置。西部文学如何以确切的身份入史是当代文学史亟待正视的问题。“西部文学”命名的实质性要素，当从“文学西部”出发，而不是纠缠于地理方位、行政区划，或者国家政治的、经济的策略，这是定义西部文学概念的合理性途径。因为只有“文学”才能够赋予“西部”以特殊的意义，这个“空间文学化”的过程也是西部文学真正确认“身份”的过程。西部文学如何走出地域性的局限，无疑应在阔深的“参照与对比”中形成一种大视野，这是其突破的关键。而超越地域限制的西部文学应该是一种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文学，一种真正具有跃上“高地”的大目光和大境界的文学。

一 西部文学：概念、“他者”身份及非文学导向

“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5年前后。其时，甘肃一著名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一组文章，针对文坛的创作实际，特别是有关西部作家的创作（主要还是指西北作家）进行专门讨论，使“西部文学”的命名正式现于文坛。多年以后，有人曾这样评价《当代文艺思潮》之于“西部文学”概念生成的意义：“《当代文艺思潮》杂志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六年，但它对振兴西部文学评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块阵地，西部文学评论界才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它发出的声音才获得全国学术界和读者群的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作家、评论家也借此被推

向全国。”^①但是，由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停刊及其他各种原因，西部文学研究在热闹了一阵之后却几近销声匿迹。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由于长期以来全国文坛及批评界对西部文学的漠视（在文学技术主义风行的年代，“守旧”的西部文学被“逐新”的批评家进行冷处理似乎是必然的），西部文学也就无法得到主流的认可与支持。正因为置身于这种边缘化的“他者”处境中，西部文学在新时期初的文学格局中，既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也没有在评论界和学界取得公认的话语地位。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虽已打开，但旋即被缩水，这种状况直到 90 年代才有所好转。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及实施，“西部文学”也以浩大的声势在文学创作及研究领域再次崛起。1992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套“中国西部文学论丛”，使“西部文学”开始初具规模地进入批评视野。张贤亮、路遥、张承志、扎西达娃等西部作家的创作受到了相应的关注，其中以“陕军东征”现象尤为惹眼，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次强劲冲击。这个时期，不仅在创作界，西部作家时有重量级的作品问世，仅陕西就有三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其他如甘肃籍作家雪漠的《大漠祭》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评论界和学界亦紧追不舍，西部作家研究随之成了热门话题。

但我们也不难省察，90 年代以来的这种西部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更多的是“非文学”性质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行为及其“舆论导向”的运作下，许多研究者才将目光投向西部文学，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西部各省区所设置的“西部研究”课题的有力倾斜（文学研究当然不在例外），都促使西部文学研究逐渐被纳入到主流话语的轨道中来。但因为这次的西部文学热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舆论导向的运作，而不同于 80 年代初的那种从西部文学本身发展态势孕育的学术自觉，所以，在学界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提升，特别是从西部文学经验中升华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更是寥寥，而文学史叙事中的西部作家仍被史家有意无意地遮蔽。换句话说，西部作家的努力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如研究者论及诗人昌耀的文学遭遇的一番话，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昌耀身上发生的一切，很典型地说明了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遭遇。而这，还是出现在一名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身上，更遑论其它新锐了。在这里，公正、道义、正派、艺术良知仍然显得那么缺乏，其实，难以理解的不是偏僻，而是对偏僻的

^①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7 页。

无形的轻视和歧视”。^①

追溯西部文学的“他者”境遇,对研究者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晰地透视西部文学的现实存在,并拓展其生存空间。西部文学的概念出现在1985年前后,本身就意味深长。从那个时候起,西部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被当成了“寻根文学”的一部分,韩少功在《文学的“根”》——“寻根”思潮的纲领性文献中,谈到对西部文学的理解,“我到新疆时,遇到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②。此后,在当代文学史叙事中,张承志、贾平凹等西部作家的声音常常被湮没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之中。其他影响较大的像张贤亮,或被看做是“历史记忆”^③的叙述者,或被看做是“为了人的尊严与权利”^④的书写者。将西部作家进行分类并设法归入各种“思潮”,是当代文学史叙事的一个策略。我们在目前较为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叙事中(90年代以来以“当代文学”命名的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却实在找不到“西部文学”这个说法。如果我们稍作延伸,仅以当代文学史而论,对地域文学现象的理论升华就有不少,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研究者对其也是乐此不疲。这样,令人费解的问题便产生了,是西部文学真的没有实绩形成所谓的“派”,还是叙述者故意对西部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毋庸置疑的是,张贤亮等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的西部言说,其文学贡献并不在“山药蛋派”或“荷花淀派”之下,而且研究者对西部文学多年的探寻已足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了,但“西部文学”之说在史著中仍为一片空白,仍摆脱不了“他者”境遇的宿命。

西部文学的“他者”境遇所造成的流弊,当然不是指将张贤亮、张承志、陈忠实这些贡献突出的、可以归入思潮的西部作家淡化,而是指将西部文学的个性消解或溶化在多种面目相似的共性当中,从而也就从根基上断送了西部文学的命脉。更有甚者,立于“潮流”之外的、“西部性”更为突出的作家,如路遥、昌耀、周涛、杨志军等,常常在文学史叙事中被忽略,而他们的努力其实也是一个时代文学景观的必要构成,尽管他们的创作方法可能不新、不时尚,但他们的叙事却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学史的基本功能当然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记忆,是为了“真实”反映文学发展

① 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理论评论卷),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② 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4月号。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④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演进的动态。我们并不是说文学史不应该以思潮的演进作为主要线索进行书写，但以思潮的演进为不易之法来应对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显然会生捉襟见肘之弊，并造成这样那样的遮蔽与失真。西部文学的遭遇即其一例。

二 文学西部：空间的文学化与概念的合理性

当我们面对西部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他者”形象时，除了追问文学史叙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遮蔽与失真外，对西部文学研究本身的反思也至关重要。事实上，“西部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由于国家行为、历史遗留等因素的介入，许多关键性环节其实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还存有较大的商榷空间。纵览近三十年来的研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究竟什么是“西部文学”？它是指一种区域文学、地域文学，还是地理概念上的文学？和这一问题相关联的，是它究竟属于西部作家创作的文学，还是在文学中反映了“西部的东西”的都可看做是“西部文学”？尽管研究者对这样的问题有所探讨，仍难以见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界说观点。这也成为制约西部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根据西部文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明显觉察到，由于“西部”的概念整体上是模糊的，所以，“西部文学”概念的界定也是模糊的。比如，西部到底有哪些省份，西部区域大到何种程度，尽管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囊括了12个省区市，包括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西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且随着这一括定，“西部文学”的区域概念也在随之扩大，但在中国传统的意识中，“西部”则主要指西北五省区，而这些年的“西部文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尽管也涉及了一些西藏、川渝等地的作家，但又往往是很牵强的。毫无疑问，十多年前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主要是针对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做出的，它更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因而，也使得“西部文学”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附着了政治和经济的含义。

说到底，“西部文学”只是一种文学形态，虽然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方位词“西部”，却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分为东部、中部或者西部。简单地从地理方位与行政区划，或者政治与经济的意义上来界说“西部”，并进而界说西部文学、西部作家则无异于隔靴搔痒、缘木求鱼。既然西部文学是一种文学形态，按理来讲，从文学的视阈上来定义何谓西部文学应该是正路，或者说具有唯一的合理性。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即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以大量的文学事实为前提的，在1985年前后的西部文学研究者那里，如谢昌余、肖云儒、余斌等人，就特别注意从文学实践出发讨论何谓西部文学。当然，西部文学的创作实践与“西部”天然地有着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书写西部”，将“西部”文学化。“西部”作为一种空间存在，在被文学化之后，与地理意义或者别的意义上的“西部”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衍变，转化成了一种文学存在，更准确地说，已转化成了“文学西部”。如贾平凹一直在写“商州”，你总不能把文学的“商州”与真实的商州相等同。这样看来，文学西部虽然与地理西部的真实性有关联，但已被赋予超越空间真实性的更多的意义，使其具有更多如审美的、想象的、虚构的能指。而这些能指也许是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的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对定义西部文学更为重要。研究者所以对西部文学的概念众说纷纭，原因是很多人没有深究西部“文学化”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西部文学，无非是从大量书写“西部”的文学中归纳、升华出来的更具整合力与概括性的一种文学形态的命名。因此，我们把西部文学看做是“写西部的文学”，而非“西部的文学”。我们这样来定义西部文学，必然有人要问：既然西部文学如其所言，那么，“西部”在西部文学中又是怎样被文学化的？西部的哪些东西被不断地文学化了？传统意义上的西部又是如何进入文学视野的？类似这样的设问非常必要，它们其实涉及了西部文学的身份认证问题。作为文学化的书写对象，“西部”必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实际也表现在文学的各个层面，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才塑造了西部文学的独特形象，并使“西部文学”概念借此获得了合理性。

西部文学中“西部”的自然山川、气候时令、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如崇山峻岭、戈壁沙漠、草原牧场、沙尘荒滩、风暴积雪、大河奔涌；如胡杨、沙柳、骆驼刺；如苍鹰在静寂的天空盘旋滑翔、骆驼在烈日下迈着艰难的步履跋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文学叙事中的“西部”，是一个多民族话语的展演空间，是一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混杂的地带，是一个汉唐文化、陇右文化、敦煌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寄生的土壤，是一个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宗教文化融汇的场域，因之，西部文学的叙事话语便有了其特殊性，即它总要或隐或显地呈现这样那样的地域文化元素，像扎西达娃的创作始终有着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那样。作家张曼菱曾言，西部文学是“由西部的文化——那种不为人所深知的多色调的文化决定的，那是

一个文学的新大陆”^①。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多元文明的深度撞击，使“西部”在凝重之外难免有一种悲慨的沧桑感，这也使西部作家总是能够融入社会的边缘及其底层去捕捉形形色色的人物，于是便形成了西部文学中人物谱系的特殊性。仅以甘肃作家为例，就有王守义创作的流浪汉系列、淘金者系列，张锐创作的盗马贼系列，邵振国创作的麦客系列等。

恶劣的生存环境、悠远的历史传承、丰富的文化样式以及相对封存的人文生态，都在无形中规范着西部人的性格，由此也形成了西部人性格的独特性。张贤亮《绿化树》中马樱花的爱情表白，不是以江南女子欲说还休的矜持，而是以“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的快语来表达其至死不渝的决心，使一个粗犷中有细腻、豪放中有温柔的西部女子的性情跃然纸上。西部这方水土所养育的西部人的身上，自然弥散着强烈的地域文化气息。这块大地上的所有生命都在艰难挣扎中生长，你只要看看在一片昏黄的无垠的沙海中坚韧生长着的胡杨，就豁然明白，这里的一切都生就了一副顽强的性格。西部人无疑是这个世界的主体，他们为了生存和繁衍，向着多舛的命运进行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抵抗，他们对于人生对于世界所产生的忧患感，远比富庶之地的人要沉重复杂得多，但多舛的命运同时唤起的是西部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自觉与自信。更由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塑型，使西部人的历史文化性格还表现为多种相反相成的结构，如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九死不悔的忧患意识与指向未来的时代觉悟、恒定稳健的固守性格与渴望变革的内在激情、侠肝义胆的古道热肠与诙谐幽默的处世机智、淳朴宽厚的人情世态与追踪文明的紧张努力，都使西部人的性格处于两极震荡中而发生着裂变甚或蜕变。这才是西部人精神存在的文学表达。

“西部之美”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从汉代沉雄大气的石雕开始，“西部之美”的风致在中国艺术史上便日见其宏大，在唐代终于形成了一个高峰，如苍凉豪迈的边塞诗、奇伟壮观的敦煌壁画、激越悲壮的秦王破阵曲、劲健沉雄的大面金刚舞等，均以其阳刚、雄健、沉郁的风格而为世人瞩目。直到当代西部文学，这种崇尚力量、刚健、雄浑、大美、清新的风格诉求也未见式微，而且在张承志、路遥和杨志军等众多西部作家的创作中被发扬光大。不妨先阅读青海作家杨志军《环湖崩溃》（《当代》1987年第1期）中的一段文字：

① 张曼菱：《荣幸的历险——我写西部的创作手记》，载《中国西部文学》1988年第1期。

观潮山没有倒，巍然耸立着，任大冰大浪砸击坚实的身体。大湖被激怒了，将冰块一层一层朝上推去，顿时淤住了观潮山的脖颈。紧接着，又一个冰峰崛起，观潮山没顶了，漫天冰浪盖住了牧人威武的群像。远处，大湖漫荡，如黑云冉冉而来，也送来了高古的创世年代的悲壮旋律。混沌荒风，原始水浪，恢弘的地平线，立定脚跟的观潮山——黑铁色的上帝，无边的地壳板块和大气层一样厚重的坚不可摧的寂寞，茫茫天穹下，奥博辽远的大荒原——一个神话世界，一个密宗天地。

这段文字写得大开大阖而挺拔有力，颇具司空图所谓“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①的豪放风格之神韵。作者通过大写意手法——如营构巍然耸立的观潮山、不断崛起的冰峰、漫天扑卷而来的巨浪、创世年代的悲壮旋律、黑铁色的上帝、坚不可摧的寂寞、奥博辽远的荒原等大意象而底蕴充沛、动静结合、绘声绘色地写出了“环湖崩溃”的过程，而这些大意象却只能在“西部”这样的时空中诞生，作者通过这些大意象的组合隐喻性地揭示了西部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将要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革，这不愧是西部的独有之文。

上述不难看出，西部文学中的“西部”尽管与地理方位、行政区划，或者政治、经济策略有一定的关联，但其根本在于“文学”，是“文学”赋予了“西部”以别样的意义，也只有在文学的视域中，“西部”才显得如此的多姿多彩与耐人寻味。正因为这样，我们便将目光锁定于“文学西部”，也就是更多地聚焦于西北作家的创作，而适当延伸到西藏、内蒙、川西北，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地区的作家创作更具有“文学西部”的性质。而就西部文学本身而言，也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包含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综合，又将其不断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但正如研究者所言：“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体验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因作者的意图开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也不因读者的类型和特性而开始或结束，它们是所有这一切或更多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②

①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见《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② [美]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三 超越地域：西部文学亟待品格的提升

前文说过，所谓西部文学即是从大量“写西部”的文学经验中提升的一种文学形态的命名，这种命名更多的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西部作家自身的表白。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极少发现哪位西部作家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西部作家，张贤亮、昌耀、扎西达娃、阿来、杨争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没有，只不过研究者往往将他们作为西部文学的创作主力来研究罢了。这个现象并不奇怪，以1930年代的“京派”而论，并没有人明确发表宣言或结社，称自己是“京派”作家，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大致相近的文学趣味与审美诉求，活跃在《现代评论》、《骆驼草》、《水星》、《文艺杂志》等此类重要的北方文学报刊上，故这些作家被研究者命名为“京派”作家，其他如同时代的“海派”，情况也相类似。当研究者将这些作家指认为“西部作家”的时候，既是对他们创作现象的一种认定，也是对其创作趋势的一种预设，而这种认定与预设其实也构成了一柄双刃剑。

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这种对于“西部作家”的身份指认，其实既成就了他们同时也局限了他们。所谓“成就”，是把他们放在地域文化环境中加以发掘，能够更好地把握他们的创作特色，揭示其创作的优势及本土资源；所谓“局限”，是指由于过分凸显他们创作的地域性因素，往往又忽略了他们创作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走出地域的）文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的人性、人道以及“人类性”的诸种内涵及意义，使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因为任何有作为的作家都不是为了一个“地区”而写作，正如鲁迅写了“未庄”未必就是“未庄文学”，沈从文写了“湘西”未必就是“湘西文学”一样——文学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从文化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其实也不过是具有西部特色或风情的文学，更何况在“西部文学”里面，每个作家又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异甚至可能超出地域。而如果从文学对象、文学的审美意识、文学的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来审视，即可以拆解“西部文学”的“绝对”概念。

另外，还可看出，如果过于强调“西部化的文学”或“文学化的西部”，显然使其在总体上容易产生这样几个误区：一是可能沉迷于渲染西部陋习及暴力色情的“想象化”描写；二是可能使题材选择、主题开掘、风格表述诸方面趋于单一与单薄；三是可能拘泥于具体的政治战略的图解，

甚至形成政策化的形象叙事。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西部文学都应该摆脱“沉重的翅膀”,在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与世界、放眼未来中去促进西部文学与外界的密切交流与健康成长,从而重铸自身的文学史形象与价值。因此,有必要重申现当代文学经验,即“让文学回归文学,卸掉它身上那些多余的尘埃、重负”,而要真正回归文学,关键还在于作家——作家的素养、作家的视野、作家的胸襟、作家的人文关怀,等等,这些因素才是西部文学走出“西部”、超越时空的关键所在。

就美国作家福克纳而论,可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域性作家,他的书写很少离开以故乡密西西比河畔的奥克福县为蓝本的“约克纳帕塌法县”。然而,“几乎随着每一部新作的问世,福克纳都更深刻地刺进人的灵魂,刺进人的伟大和自我牺牲的力量、权力欲、贪婪、精神的贫困、褊狭的胸襟、滑稽的顽固、极度的痛苦、恐惧、退化了的变态”,而“他的小说难得有两部在技巧上相类似,好像他想凭借着这种不断的更新,以达到他的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题材上的有限的世界所不能给予他的不断扩充的广度”,“福克纳的窘境可以这样表达出来:他悲悼并且作为一名作家夸张了一种生活方式,可他本人由于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却又永远也不能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地域主义具有了普遍意义”。^①

以福克纳之例作为言说的基点,从更宽泛的意义上选取研究对象,并从“文学”而非“西部”来探讨作家创作的优劣得失,就显得尤其重要。比如,贾平凹是一个很“独特”的作家,在地理意义上,他属于传统的西部;但在所受的文化教育上,他应该属于中原。也可能处于“西”与“中”的交汇处,所以他的创作也就难以明显归类。尽管商州确实是贾平凹文学的“起家之地”,但他仍有意识地淡化文本的“地域”色彩。然而,文学所表现的对象只不过是一道幕具,它的真意义与真价值却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敲开人类灵魂的障蔽,直达人类精神的深层并在此融汇。地域风情固然能很好地吸引读者的兴趣,但并不是总能有效地提升文学的品位,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对于已被大众认可的处于“地域性”中的贾平凹来说,“地域”又正是贾平凹长期以来难以超越自身的局限所在,如过多过近距离地审视“地域”,则很难避免题材的重复、想象力的贫乏、视野的狭小等,一旦受到外力干预又很容易非文学化。尽管贾氏所崇尚的民间文化可以进行有限的弥补,但写作的程式化却很有可能将他引入绝地。

昌耀又是一例,尽管他身处西部,青海的山河、人文地理、历史遗存

^① 吴岳添:《诺贝尔文学奖辞典 1901—1992》,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23—625 页。